

莫言研究书系

张华
总主编

Reading Mo Yan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riting Duo between
Claude Simon and Mo Yan

莫言的另类解读： 西蒙与莫言写作比较

林青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Reading Mo Yan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riting Duo between Claude Simon and Mo Yan

莫言的另类解读：
西蒙与莫言写作比较

林青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的另类解读:西蒙与莫言写作比较/林青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9

(莫言研究书系/张华总主编)

ISBN 978-7-5607-5147-4

I. ①莫… II. ①林… III. ①莫言—小说研究 ②西蒙,C.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②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4511号



责任策划:马 新

责任编辑:马银川 王立强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0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 格:720毫米×1000毫米 1/16

13.25印张 252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莫言研究书系》编委会

总 主 编 张 华

副总主编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编 委 张 华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 齐林泉 孙书文 丛新强

兰传斌

《莫言研究书系》总序

◇张 华

我们谋划编辑出版《莫言研究书系》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1986年，创刊《青年思想家》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1988年，由《青年思想家》杂志牵头，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全国第一部《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莫言成了《青年思想家》的栋梁作者，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青年思想家》里。2000年后，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导师……与莫言交往二十多年，可谓知根知底，友情笃厚，持续关注。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从表层到深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意识、主题内涵、艺术风格、人物形象与意象、语言特色等都有广泛的探索，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幻境”，也是一个“中国的缩影”。他说：“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莫言《小说的气味》）因此，莫言

莫言的另类解读：西蒙与莫言写作比较

Reading Mo Yan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riting Duo between Claude Simon and Mo Yan

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外一股“莫言热”正在持续升温。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解读、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特别是在研究者中，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方法、范畴和观点。无论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我们现在推出这套《莫言研究书系》。这个书系的作者群，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也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学者，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给他们提供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

《莫言研究书系》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是一个开放的书系。第一批书——《莫言研究三十年》、《莫言弟子说莫言》、《乡亲好友说莫言》、《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海外莫言研究》、《莫言与世界》六种，2013年一经推出即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广受学界好评。这也坚定了我们继续将更多莫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纳入该书系出版下去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该书系将推出第二批：《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莫言的另类解读——西蒙与莫言的写作比较》、《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莫言小说创作论》、《“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等。敬请方家指正。

本书系是个开放的书库，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

2014年3月

（张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原《青年思想家》杂志第一任社长）

写在前面的话

◇林 青

本书主要针对法国作家克罗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和中国作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其实，西蒙和莫言都是丰产作家，但我更愿意将研究精力放在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各一部作品上。研究的目的在于铺开的面有多广，而在于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两部题材相同、感触世界方式相近的作品来探讨两位作家写作的异同。作比较研究有时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在研究时我也经常会对作品之间的可比性产生怀疑：在怎样的条件下两位作家或两部作品才可进行比较？是不是作品或作家或流派相互影响才构成比较研究的必需条件？这些疑惑在开始时总是困扰着我。但随着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疑惑渐渐地化解了，我发现只要在同一文学样式中，只要作家在感知外部世界时有共同的趣好或关注，就有比较的前提。而且，差异的意义大于相同的意义。我以为这才是比较研究的价值所在。

另外，正如本书现在的题目《莫言的另类解读：西蒙与莫言的写作比较》一样，我的研究视角更倾向于写作本身，也就是文本的研究；更倾向于通过阅读快感来佐证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归类，也可以不归类，但确实代表了一种思潮，一种通常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其实，主义和流派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只不过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当然也可能有害于理解。但研究就是这样，需要作归纳、排队。除此之外，我还想说，研究或评论需要超越文本，但必须从文本出发。研究是一种深度阅读，这种阅读也可以将文本作为起点去讨论也许不属于文学范畴的问题，但我更情愿由文本出发最终回到文本，

即回到以文字构成的文学。

这本书的基础是1996年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语文学系所做的博士论文，原来的题目是《比较研究：克罗德·西蒙和莫言的文学生成》(Essai de comparaison :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chez Claude Simon et Mo Yan)。毕业后，我脱离了文学研究，转入IT行业，一干就是近20年。2012年，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我非常兴奋，为莫言先生的才华得到世界的认可感到骄傲。随后，我与我的同学金惠敏先生聊起莫言获奖以及我在海外研究的题目，他很高兴，鼓励我将博士论文翻译出版。“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是长期不作研究，笔都荒了；二是很难挤出时间，尤其是整块儿时间。但心气儿在，只有“边生产边革命”了。译稿完成后，山东大学的丛新强老师将之推荐给了莫言研究丛书编委会，书稿得到编委会的鼓励和肯定，同时有专家希望书稿能再扩展一下，而这也正好契合了我的想法，因为我总觉得还应当从语言风格上再写些东西，原因很简单：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最关键的是如何将作家的感悟以一种恰切的方式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语言就是思想。出于这种想法，我对本书作了一定的扩充，添加了“文本之趣”和“诗如自然”两章，同时对原来的部分也作了适当的修订。

如今付梓成书，首先要感谢金惠敏同学的鼓励和支持，使我有缘“重操旧业”；同时还要感谢山东大学的丛新强老师的推荐以及山东大学的专家教授对本书结构调整提出的宝贵意见。

当然，对这一比较研究帮助最大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玛蒂娜·雷奥娜(Martine Léonard)和玛丽·克莱尔·悦特(Marie-Claire Huot)，她们一位是19~20世纪法国小说研究专家，一位是东亚研究和汉学专家，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各方面的指导、建议、支持和帮助。同时，还要感谢米歇尔·彼埃森斯(Michel Pierssens)——认识论批评(épistémocritique)创始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及当时的法语文学系主任，他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当然，还要感激的是我的妻子谭瑾，她以免除我一切杂事的实际行动鼓励我，并承担了很多校对整理的工作。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马银川、王立强，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绝不是套话，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深有感触。

2014年7月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与道家学说	(11)
一、后现代主义作家	(11)
二、后现代主义特征	(13)
三、德里达与道家学说	(17)
第二章 感知型描写:文化与历史	(37)
一、感知描写中的叙述结构	(41)
二、感知描写中的物质性与奇想	(44)
三、感知描写中的历史意识	(57)
第三章 视觉组合与文化积淀	(70)
一、写作与绘画的交集	(71)
二、写作中的绘画结构	(73)
三、红色	(95)
四、自由与自然	(112)
第四章 文本之趣	(121)
一、文字与文学	(121)
二、无字之述:西蒙的静默意识流淌	(124)
三、状物无物:情绪的酣畅宣泄	(131)
四、阅读与文趣	(145)

第五章 诗如自然	(154)
一、后现代诗：不可测的潘多拉	(154)
二、形于“物”而超然物外	(156)
三、形于“物”而借物生情	(161)
四、异曲同工	(167)
第六章 二重自我	(169)
一、语言的文化及个人制约	(169)
二、二重自我：本我的叙述	(171)
三、二重自我：激情化的叙述	(177)
四、二重自我与文化差异性	(185)
结 语	(190)
参考文献	(194)

引 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北宋）苏轼

本书旨在以一种跨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对西蒙和莫言进行研究。研究的目标是通过阅读这两位作家的各一部作品，即《弗兰德之路》^①和《红高粱家族》^②，探讨现代写作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选择西蒙和莫言作为研究目标绝非偶然，首先，他们在各自的国度都是先锋派作家：西蒙是法国新小说的创始人之一^③，而莫言则被看作中国新潮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先锋派作家^④。冠以何种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写作中都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趣好。应当指出，这两位作家不论从文化还

① Claude Simon, *La route des Flandres*（《弗兰德公路》），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0。后面该书的所有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且标为中文译名。

② 《红高粱家族》（包括五部小说：《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后面该书的所有引文均出自这一版本。

③ 我本人将法国新小说看作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其原因有二：首先，新小说整体上超越了现代主义的基本规范，尽管某些方面还可以用现代主义的视角释读（比如，人们可以在米歇尔·布托的《变》和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中读出现代西方人的困惑）。新小说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就是化解意义，或言解构（Dé-construction），或言超越意义，阿兰·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和西蒙的观点证实了这一倾向。这种观点恰好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契合。其次，从时间的角度看，新小说比后现代主义早一些诞生。根据依哈勃·哈桑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一词的第一次出现也许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但 60 年代后，一些后现代主义现象才开始吸引文化和学术界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一种思潮。当然，时间上的差距并不能阻碍我们用这种视野审视稍早出现的新小说派作家。其实，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审视世界的视野和思想方式。

④ 中国先锋派小说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流派不再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它所代表的倾向很像法国新小说。中国的先锋小说流派很难归纳出所谓的特点，因为它的创作展现给人们的是多样的、开放的，从不拘囿于某种信条。对新表现形式的持续探究构成了它的总体特征。除莫言外，中国先锋派小说作家还有马原、陈村、残雪、王蒙、阿城、刘索拉、格非、余华、苏童等。

是历史层面都处在截然不同的境遇中,甚至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中国的新潮小说比法国新小说晚了30多年。但时间上的差距并没有阻碍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即已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学和哲学思想。^①在这些思潮中,法国新小说占有突出的位置:法国新小说四大发起人(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和娜塔莉·萨洛特)的作品都已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新小说的思想广为中国批评家和作家接受,因为这些思想颠覆了传统的规范,在小说的叙述方面具有创新性,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法国人的眼里略显陈旧。^②事实上,作家们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上表现出的兴趣恰恰反映出中国文学的现实状况。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蜕变转型期:一方面,中国作家不想重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老路,因为这种教条窒息作家的表达自由;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在割断与传统价值观念联系的同时,又显得无可适从,亟须在西方思想库中寻找新的理念,重新定义文学。而新小说恰好是文学界经常能够从中获益的思潮之一。站在历史的背景下,不难看出我们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以说,中国新潮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但要指出的是,中国新潮小说不是简单的模仿,它保留着中国先锋派的很明显的特征,也就是说,保留着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特质。文化历史的因素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这些因素构成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使我们能够在一种跨文化视野中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两位作家。

另一个促使我作比较研究的原因是在写作层面。这两位作家的共同点都是将家族史作为叙事素材,而且都是通过人物/叙事者回忆的形式再现的。他们的写作包含一个传统的主题:爱情、战争和死亡。但这些素材都是被一种体验过滤的,也就是说,通过一个重新体验过去事实的人所产生的感知而确立的。历史的真实性和感知性的叙述构成一种悖论,而这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现象学告诉我们,体验不是一

^①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逐渐向外部世界开放,各种西方现代思潮通过翻译被引进中国。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批重要的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有:西蒙娜·波伏娃、阿兰·罗伯-格里耶、杰姆斯·乔伊斯、法朗兹·卡夫卡、让-保罗·萨特、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格思、马赛尔·普鲁斯特、克洛德·西蒙、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布托等。这些作家很受中国当代作家的欢迎,他们的作品被大量阅读。此外,80年代,一些西方思潮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萨特潮”、“尼采潮”、“弗洛伊德潮”、“结构主义”、“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一个接着一个涌入,各类文学和哲学丛书也呼应而出: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200种,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以及各种思潮丛集。

^② 《新小说派研究》是由柳鸣九1986年编撰出版的一本新小说派评论及作品节选的文集,篇幅长达700多页。这部文集深受中国文学界的欢迎,因为它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甚至还有一部西方文艺批评的文集索性就拿娜塔莉·萨洛特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作为文集题目:《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这部文集共两卷,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种简单的物理和生理的过程：它不可能摆脱作者牵涉其中的文化和历史境遇的参与。^① 因此，感知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的差异性将通过我们的比较分析彰显其价值。

促使我进行比较研究尝试的第三个原因是基于如下的观察：如果说感知是使作家获取过去世界并将其现时化的一种方法，那么，绘画的构思方式、重视语言趣性和诗性以及叙述的主观性（自我的二重性）将变成对感知的理想表达。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文本构造中，我们才得以领悟到一种文化的牵涉，一种世界的视野，而它注定指挥着写作。正是西蒙和莫言在他们的写作中所共同呈现的感知、绘画式构思、语言及叙述独具匠心，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思考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因素产生的效果。

我认为，有必要在展开研究之前，对以前有关西蒙和莫言的研究作一下回顾，因为我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存的研究有一定的关联。

有关西蒙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新小说诞生之时。这些研究可以归结为对新小说五花八门的评论，正如新小说本身除了对创新持续探究外很难找出一个所谓的标准一样。^② 同样，对西蒙的批评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源自现象学、语义学、社会学，也有的源自电影学、存在主义、艺术批评、文体学等，不一而足。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有些也是相互关联的。根据 1986 年出版的“克罗德·西蒙塞利斯^③研讨会”文集所附书面清单，仅专著而言，截至 1986 年就多达 16 种之多，这还不算之后发表的专著，如《论克罗德·西蒙》（吕西安·达朗巴克，1988）、《小说语言与纪要式话语》（米歇尔·白特朗，1987）、《西蒙：写可见事物》（塞拉·布利通，1987）、《西蒙两部小说中的时间概念》（马克特·林达尔，1991），等等。而论著中相关章节和独立文章达到 200 篇以上。^④ 进入 21 世纪，对西蒙的研究更加丰富，仅在亚马逊网站上，相关论著就数以百计。

在相关的整体研究中，我本人更倾向于两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因为普遍的共识是西蒙的写作特别适用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关于现象学研究，在我看来首先要推荐的是吕西安·达朗巴克的《论克罗德·西

^① 这是梅尔罗·庞蒂思考的一个问题，参见：Maurice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感知现象学》，一译为《知觉现象学》），Paris：Éditions Gallimard，1945。

^② 阿兰·罗伯-格里耶多次强调，新小说从不故步自封，在新小说之后还会有新新小说。此外，人们可以看到，新小说的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尽管他们都被贴上“新小说”的标签。

^③ 塞利斯（Cerisy）为法国一座城堡的名字，20 世纪 70 年代在那里举办过多场有关新小说的国际研讨会。

^④ 1985 年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U. G. É（出版机构）重印了 1974 年在塞利斯召开的西蒙专题研讨会的文集，新版文集还增添了一个截至当时的新书目，我在正文中所罗列的统计数据正是源于此书目。

蒙》^①，它的价值在于始终围绕着文本的视觉成像和感觉的结构组建展开论述。吕西安·达朗巴克的论述突出“文化过滤的视角”而非无文化的感觉。总之，原始的思想及滞留在视网膜的形象构成了西蒙相应的表现形式，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始终吸引着论述者的注意。这部论著的特点在于文化与感知之间的相互影响所形成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感知者(人)与被感知物(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

另一部论著，即约塞特·霍朗贝克的《克罗德·西蒙小说中的巴洛克绘画元素》值得我们关注，它的价值在于将西蒙写作中巴洛克风格与绘画表现手法之间的关系勾勒得很清楚^②。这是一部专门研究西蒙写作风格的论著，研究者致力于将小说中的人物体验和感知与描写所营造的想象、幻觉和夸张氛围融合在一起加以研究。在与法国文学中的巴洛克精神作比较时，约塞特·霍朗贝克成功地提析出随时光流淌而浮现出来的人类体验中的诗性。我觉得这部论著非常有意义，作者从头至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情感要素和对生命的思考嵌入巴洛克绘画结构的分析之中。约塞特·霍朗贝克的研究贡献在于重新发现现代作品中仍沉淀着某种艺术传统。这样一种跨领域的研究视野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西蒙作品的另一种可能性。

作为现象学研究，还有必要提及斯图尔特·斯科斯的《论克罗德·西蒙的小说》^③。与上述研究不一样，斯图尔特·斯科斯将重点放在了时间与空间构建中的感知作用之上，由此确立了一系列可见事物和不可见事物之间的关系，诸如现时(时间的缺失)与过去之间的不可靠性、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的关系等。论者不局限于内在本体的研究，而是竭力突出文本制造的功能，以使所表现出的情感更有价值。

就结构主义研究而言，让·利卡都(Jean Ricardou)的探索(“Tel Quel”派)是很有意思的：在其组织的有关新小说的塞利斯研讨会和他本人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在极力通过发明一些新概念挖掘文本之特性。利卡都关于克罗德·西蒙的研究集中于内在文本性和一般的交互文本性方面，还有所谓“自动—再现”的形式。对“表达—再现”教条进行批评的同时，利卡都更侧重于写作语言的生成。写作语言的繁衍方式构成了利卡都研究的核心。首先，论述者从西蒙的文本中提析出一些写作语言的生成要素，诸如语态变形、同音异义词的文字游戏、碎片表述、特质词语等，并由此归纳、收集了一些由此类元素构成的语言生成品。需要指出的是，利卡都的努力不在于根据某种“良知”或“先定的意识形态”重新构造一种形象，而在于揭示文学语言的生成功能。他所

① Lucien Dällenbach, *Claude Simon*(《论克罗德·西蒙》),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8.

② Josette Hollenbeck, *Éléments baroques dans les romans de Claude Simon*(《克罗德·西蒙小说中的巴洛克绘画元素》), Paris: La Pensée Universelle, 1982.

③ Stuart Sykes, *Les romans de Claude Simon*(《论克罗德·西蒙的小说》),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做的一切，就是要从文本层面上确立符号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追随所谓的“写作的奇遇”^①

另一个研究也是从结构主义而来的，这就是米歇尔·白特朗的《小说语言与纪要式话语》^②。根据作者的论点，西蒙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认知论性质的小说，小说语言的生成更应当是机械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因为写作是一个以叙述为核心的不间断的自动一再现过程。“表达一再现”的神话被真正的文本秩序所取代，即被纪要式写作和游戏构建中的智巧性所取代。按照论者的说法，这种“不同材料的精心组合”的技术恰恰体现在西蒙跨文本的写作实践中：交互文本性、准文本性、形而上文本性、超文本性和结构化文本性。写作与接受之间的交换是互动性的、建设性的。

相比西蒙的评论分析，有关莫言的评论和论著也有一定数量，但专著并不是很多。相关论述大多是些散见于批评杂志中的一般文章和论文，比较系统介绍莫言的专著为《莫言论》^③。在对莫言的文学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三种倾向：

(1)一部分学术讨论集中在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张志忠在《莫言论》中对莫言小说所表现的中国乡土意识和以红高粱为象征的生命图腾进行了分析。这两个要素在作家构筑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莫言写作的特征。玛丽·克莱尔·悦特(加拿大汉学家)通过《红高粱家族》反映出来的视觉感知，力求读出莫言的地域概念。^④王蒙和王干的评论试图证明对世界的认知与感觉之间的关系：认知与感觉决定于生命中情绪、社会和道德的感受体验。^⑤

(2)另一类评论则集中在“寻根”问题上：莫言最初的成名之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很自然地被公众看作发动于那时的“寻根运动”^⑥的产物。人们发现，莫言小说中人物的激情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

① “写作的奇遇”是利卡都主张的一种新写作观念，与传统的“奇遇的写作”相对立。有必要说明，利卡都的研究非常复杂，几乎涉及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很多的专门术语。[分别参见：Jean Ricardou, *Pour une théorie du nouveau roman*(《为了一种新小说理论》),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1; Jean Ricardou, *Nouveaux problèmes du roman*(《小说的新问题》),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8]

② Michel Bertrand, *Langue Romanesque et parole scripturales*(《小说语言与纪要式话语》),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8.

③ 张志忠：《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参见[加]玛丽·克莱尔·悦特：《莫言与张艺谋：两片红高粱地》，《东亚调查》(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年度讲座论坛文章选编，为协会内部出版物)，蒙特利尔，1991年，第81~90页。

⑤ 参见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寻根运动发生在1985~1988年间，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反思运动，它力图重新发现那个时代中国人得以立身的价值观念。

莫言的另类解读：西蒙与莫言写作比较

Reading Mo Yan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riting Duo between Claude Simon and Mo Yan

在传统的价值观下被压抑和扭曲了。季红真和李洁非即持此观点。^①就寻根问题在谈到莫言的写作风格时,有些文章,诸如吕芳的评论,则将莫言与加布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了比较,并试着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位作家在民族证身过程中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②

(3)莫言《红高粱家族》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文化和反崇高的倾向吸引了很多批评家的注意,这些批评家将其视为后现代主义特征之一。应当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刚刚开始,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但一些中国批评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这些概念。其实这并非偶然,实际上在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它们集中反映在价值观离心化和意识形态重构之上。由于这类批评牵涉到一些较为深奥的跨学科理论和从西方借鉴过来的非常特殊的词汇,因此没有形成一种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批评视野。在这类研究中,陈晓明和王宁作了一些很重要的尝试,他们力图利用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对中国作品进行分析。^③

上述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尤其是对西蒙的研究。而本书则采用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不局限于单一文化视野,用跨文化(或言“文化交互”)的视角分析这两位作家。

在这两位作家所处的后现代主义氛围中,我们的讨论将涉及文学作品的一般性问题,诸如写作的本质、意义、叙述逻辑、时间/空间等。也就是说,在西蒙和莫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特性将可以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加以阐释。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特征,即不确定性/内生特质、悖论超越和空无概念,恰恰可以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得到印证。因此,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不可绕过的文化和历史氛围。

而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我选择梅尔罗·庞蒂的感知现象学作为分析的另一个工具。原因很简单:感知对于这两位作家是基础性的问题。对世界的观视、文化、历史、时间/空间概念、写作的绘画式的构思、叙述方式,这一切都与感知息息相关。还需强调的是,现象学研究还能够使我们澄清两位作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感知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文化基质而不是生理反应。此外,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的理论,尤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接受思想,对本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

^① 季红真和李洁非的文章是寻根派评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两人在不同的文学评论期刊上写了大量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

^② 参见吕芳:《新时期中国文学与拉美“爆炸”文学影响》,《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③ 参见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王宁:《接受与变形: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文本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语言,按符号学的说法就是,文本即言语活动^①的结果。语言的运用在文学中已经不单单是介质,而是内容,因为对作品的感受不单单来源于所谓内容,呈现方式本身就给人以美感,就已经达到了阅读享受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利用现象学的切入进行研究,不纯粹是方法论的问题,这种方法本身就接近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准确地说,感知现象学正是要挣脱预先设定的形而上学的束缚,而将分析感知性的重点落脚于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之上。这一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们想起主张解构逻各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②。所以,我们的分析结果经常与后现代主义视野相遇,或者说,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可以通过感知现象学加以印证。

当然,西蒙和莫言之间的相似性可能仅仅是推动本研究的一部分因素。而真正使我着迷并激励我的,其实是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差异性。两人同样在写作中融入一种感知和一种相似的叙述,但效果大不一样。这些差异性恰恰显示于文化层面。换一种说法,如果没有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的人的体验,现象学的分析毫无意义。因此,我将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解释两位作家的差异性上,分析为何一种相近的写作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一部作品的生成首先是一个同时反映创作激情、作家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文化社会背景的过程。简言之,这一过程就是“意义的多数性”^③的源头。一部作品的潜含意义是通过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中的阅读本身来实现的。作为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在阅读西蒙时,我不可能摆脱自有文化的介入。而这种介入是通过西蒙与莫言不同文化底蕴的文本之间的比较来实现的。比较阅读也是一种由文本衍生出来的嫁接,因为任何一种文本相对另一种文本都是开放的,任何一种写作都可以指向另一种写作。正是这种永不休止的嫁接运动才能显示出文化的差异性^④,而我们所希望浮现出的意义也正源于这种差异性。因为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文本的智慧恰巧是通过“最小的差异(Mimesis)”^⑤而产生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提出了研究的假设。

① 这里所指的言语活动是符号语言学的概念,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应用,就文学而言,它凝结着作家的个性、文化特征,是对呈现物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参见第四章的相关论述)

② 德里达在其题为《“生成和结构”与现象学》(“Genèse et structure” et la phénoménologie)的文章中曾讨论结构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参见: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写作与差异》),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pp. 229-252)

③ Roland Barthes, *Œuvres complètes* II(《罗兰·巴尔特全集》第2卷),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p. 784.

④ Sarah Kofman, *Lecture de Derrida*(《德里达的阅读》),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4, pp. 16-40.

⑤ Roland Barthes, *Œuvres complètes* II(《罗兰·巴尔特全集》第2卷),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p. 468.